

《盛世危言》的成书、增订及版本

武 曦

郑观应及其著作《盛世危言》（下简称《危言》），近些年来述者甚众，各抒己见，各持一说。有论郑观应之思想，有论郑观应之生平活动；论《危言》者，有立论于政治，有立论于经济。但综观诸家篇章，论及《危言》创作和版本的却不多。即有论者，亦少详考。其实，弄清《危言》的创作和版本，是深入研究郑观应的重要环节。

《危言》的社会影响

在中国近代社会，《危言》是一部影响较大的论著。作者郑观应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陆续撰稿，至二十世纪初八卷本（庚子本）始刊行，共用了二十六年的时间。二十六年（一八七四年——一九〇〇年），作者备尝艰辛，屡遭蹶顿，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洋务和中国近代工矿企业的兴办；并在各项政治、经济活动中，不断地深入实际，考察社会。因此，这部“无补时艰，徒深愤惋”的《危言》，^①不仅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、经济概况和郑观应的活动与思想，同时还深刻地揭露、批判了列强的侵略活动与清政府的腐败。它和同时期的一些洋务派、改良主义者的著作相比，有着论述全面、感性知识丰富的特点。客观上存有唤醒

社会、鼓吹变法的积极作用。

《危言》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辑成初稿的。其初稿辑成不久，很快地就被统治集团所重视。一八八四年兵部尚书彭玉磨首先为其作序。序文赞扬该书不是崇尚皮毛、购船买炮的一派空话，而是洞察利弊的“时务切要之言”。将其付之实施，能使“国家兵强，四夷宾服”。^②嗣后，一八九四年五卷本（甲午本）刊行，它的影响由小及大，迅速向四围扩散，且越来越大。至一八九五年四月，经江苏按察使邓华熙删正进呈，次月光绪载湉批飭“总署刷印二千部，分散臣工阅看”以后，^③更是洛阳纸贵，“求书者络绎不绝”，^④掀起一股“大地遍风行，流传同《抗议》”的阅读热潮。^⑤如盛宣怀披览之余，感慨不止云：“我国家能痛定思痛，发奋有为，目前割地偿费，再吃巨亏，犹可以为善国。如再游移敷衍，不能用人，恐各国从此生心，偏安之局，吾辈眼中尚及此情形也。”并要郑观应再寄二十部，让“都中大老以醒耳目”。^⑥同样，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盛行，戊戌变法运动前夕，《危言》又得到维新派的推重与赏识。如陈炽的序文，赞誉此书是“维新之治之大一统的端倪”，并称有了《危言》，他那“卒卒未果”的《庸书》可以不必再作。又如康有为、梁启超得到郑观应寄赠的《危言》以后，都很认真的细加研读。一八九六年，梁启超、汪康年在上海办《时务报》期间，梁启超不但将《危言》列进《西学书目表》内，选入变法必读书刊之一。^⑦并且还采纳郑观应的意见，撷取《危言》主要内容，刊载《时务报》上，以期当道触目惊心。

盛宣怀视《危言》为清凉剂，要使“都中大老以醒耳目”；康、梁视《危言》为管钥，要启维新改良的大门。是以《危言》便不胫而走，畅销书市。《危言》十四卷本（乙未本）刊行以后，郑观应自己估计各处翻印的《危言》“已销一万五千部”，^⑧不

包括他自己刊印的五百部和总署刷印的二千部。在资产阶级“百日维新”期间，《危言》充斥书坊，比比可见。有的商贾图牟厚利，把《危言》缩印成小本、石印本。还有的书商将郑观应的早期著作《易言》，充作《危言》的续编、二编等抛售书市，致使真伪杂陈，以讹传讹。为此，上海道台蔡钧应郑观应所请，专门颁示“祇准翻印大版，不准石印缩本”的告谕。（详见本文附录）事隔数年，《危言》再次增订刊行时，书商欲演故伎，郑观应再一次函请上海道台袁树勋出谕禁止，书商才始有收敛。但是，这部能适合当时政治需要的《危言》，通过几次畅销，它的影响益加广远。原先其只限于社会的上中层，后来“场中考试常出该书所叙时务为题目”，“成为应考的举子和想通晓时务或洋务的人，不可少的参考书”，遍及到社会上许许多多的应试考生，甚至如孙中山这样的青年爱国志士。⑩

《危言》的成书、正订

《危言》几经增订和书商的翻印，给《危言》的成书、刊印的研究，留下了不少的困难，从而引起研究者的聚讼。有同志认为《危言》五卷本辑于一八九二年初，刊于一八九三年，其后数年续作，至晚是一八九五年始编有稿本；又有的同志认为《危言》成书于一八八四年，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，原因是书中大多数的内容是一八八四年以后的事，至于刊行时间，则认为至早是在一八九三年秋冬之间。笔者认为两说均有一定的理由。

“《易言》改《危言》，冀以开民智”。⑪将《危言》看做《易言》的续集，或增补，是众所不疑的。这正如作者自己所说：

将（《易言》）原稿三十六篇，删并为二十篇，仍其

名曰《易言》，改“杞忧生”为“慕雍山人”，意期再见雍熙之世。迄今十有九年，时势又变，……自顾年老才庸，粗知易理，亦急拟独善潜修，韬光养晦。爰检旧筐，将先后所论洋务五十五篇，请家玉轩京卿、陈次亮部郎、吴瀚涛大令、杨然青茂才先后参定，付诸手民，定名曰《盛世危言》。①

据此，我们将《危言》的编就，大体上划为两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作者撰稿五十五篇，辑成《危言》的未定稿；第二阶段，作者和郑藻如等继续充实、修改与正订《危言》未定稿为付印定稿。

第一阶段，据彭玉麀甲申年（一八八四年）的《危言》序、《待鹤山人六秩寿诗唱和集》中陈旭（印波）的和诗夹注、龙佐才所作“诰授荣禄大夫陶斋方伯夫子大人七十大庆祝辞”的记述，是从《易言》二十篇刊印的同治十三年（一八七四年）开始，至光绪甲申年止。这十年内的局势变化不定，内则每况愈下，外则强邻日逼，清政权岌岌可危。郑观应深受国家危亡的威胁，而随手扎记有关安危大计和安内攘外之道的五十五篇，将其编辑成书，完成《危言》的未定稿。兹将陈旭的和诗夹注与龙佐才的寿辞摘引如下：

《盛世危言》一卷成，勋名干济喜重论。

（夹注：大著有《盛世危言》一书，洋洋数万言，洞明中外时势，久为士林所许可。）

琅琅佳制诚堪诵，事烛机先志不昏。

（夹注：大著成于光绪十年，预知有去岁播迁之变。）

——《待鹤山人六秩寿诗唱和集·陈旭和诗》②

……佐才念年前获读吾师陶斋先生《盛世危言》一

书，深叹吾师识高量远，言之有物，非时流寻常摘句可望肩背。

——龙佐才：《诰授荣禄大夫陶斋方伯夫子大人七十大庆祝辞》^⑬

陈旭和诗作于一九〇一年。夹注“大著成于光绪十年”，说明光绪十年，即一八八四年《危言》确已编成未定稿，并命名为《危言》。又，龙佐才寿辞作于农历辛亥六月十七日（公元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二日），辞称“念年前获读吾师陶斋先生《盛世危言》一书”，证明早在二十年以前，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郑观应的《危言》未定稿，已在朋僚中传阅。彭、陈、龙均是郑观应同时期的人，尤其是彭玉麐，不仅是郑观应的好友，而且还是郑观应的上司，关系十分密切。一八八四年是他委派郑观应总办湘军营务处，接着又派他去侦察军情。他们三人的序言、和诗、寿辞所涉及到的《危言》情况，是比较真实可信的。但是，症结的所在，确如有些同志所怀疑的，在《危言》里记有不少一八八四年以后的内容。我们认为，之所以会如此，是有两个因素所致：一是作者在一八八四年以后，持续地充实、修改《危言》未定稿；一是正订者除文字润色外，还“参以鄙见”。而后者颇为突出。就《危言》五卷本而言，共著目七十四篇，正文五十七篇，附录十七篇，附录几乎占全书的五分之一。而附录的内容为数不少是正订者或其他人，在一八八四年以后所发表的文章。为此，经过多人正订、集社会思想之大成的《危言》，尽管有一八八四年以后的内容，但不能以此否定该书在一八八四年以前已经编就的史实。

第二阶段，由一八八五年开始，止于一八九四年三月《危言》甲午本付印。其间经过郑藻如、陈炽、吴广霁、杨毓辉等人

的正订、校雠和郑观应的充实、修改，而在正订诸人中当以郑藻如为先。

陶斋于余谊同宗，生同里闾。幼读书，知大义，恒以帖括为耻，乃弃去，学陶朱术。比同客淞滨，昕夕过从，结为道义交，约以有过相规，有善相辅，沆瀣诚相得也。陶斋乃出其枕秘数册，就正于余。……余时适奉调权津关榷政，旋被出使美、日、秘三国之命。草草劳人，久无以报。既瓜代移疾归，养疴田间，人事稍暇，乃出其书悉心正订。间亦参以鄙见，陶斋颇折衷相许。^⑭

郑藻如，字玉轩，又字志翔，广东香山人。他于光绪四年（一八七八年），经李鸿章荐简津海关道；^⑮光绪七年（一八八一年），出使美国；光绪十年（一八八四年）出使秘鲁，期满留任半年后赴美国返华。在由秘鲁至美国的途中忽染手疾，留美医疗，并驻美处理华工被殴事件，事毕回国。^⑯按郑藻如光绪七年出使美国起，历任日斯巴尼亚（西班牙美洲属地）、秘鲁等国使节，至光绪十一年（一八八五年）返华，据此可以推测：（1）郑藻如与郑观应“同客淞滨”，当在其任上海制造局会办的一八七八年，去天津海关道之前。郑观应出示的“枕秘数册”，不是已刊的《易言》，而是《危言》未定稿。进而证明，早在一八八四年以前，郑观应已将五十五篇装订成册。（2）郑藻如正订《危言》未定稿，至早是在其返华退职的一八八五年以后，是最早的正订者。一八九二年，他作的《危言》序，很可能是《危言》即将定稿时补作的。（3）郑藻如正订《危言》未定稿所参的“鄙见”，与郑观应的见解、主张，可能有不合之处，最后以调和折衷的方法加以解决。^⑰

至于参加正订的其他三人，看他们的《危言》序、跋差不多都比

郑藻如晚。吴广霈随郑藻如出使美日秘三国，回国后不久进招商局任局委，他与杨毓辉共事《危言》的校仇。他的《危言》跋，完成于一八九二年冬。杨毓辉的跋，完成于一八九三年春。另外，陈炽所作的序，完成于一八九三年八九月间。如果按照三者的序、跋时间，第二阶段应以陈炽作序的时间，即一八九三年八九月间为下限。但考虑到：一、《危言》五卷本“电报”篇的记载：

曩奉神机营扎委在沪采办军械及侦察中外军情，时苦电线未通。……今时甫十年，而电报已通行天下。

郑观应光绪九年（公元一八八三年）十月九日，奉醇贤亲王委驻上海，采办神机营应用军械兼侦察军情。^⑩引文“今时甫十年”，正说明《危言》未定稿，在一八九三年还没有最后定稿，正订仍未完毕。但不知引文是该年何月何日所加。二、与其在难于断定引文何时所加，和一八九三年九月“陈序”完成后，至翌年付梓以前之间，郑观应是否还在充实、修改的情况下，不如将未定稿正订的结束，划在《危言》五卷本付印的一八九四年三月较为妥当。

概括上述，一八八四年《危言》确已装订成册，辑成未定稿。一八八五年后经过郑、陈、吴、杨四人的正订和郑观应的充实、修改，五卷本即于一八九四年三月正式定稿、刊行。

《危言》五卷本刊印，是郑观应生活中的大事，他特意写了一首“《盛世危言》付梓有感”的七律。^⑪诗中以班超、贾谊自诩，表达他怀才不遇的怨望，并希望《危言》能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采择。

清夜焚香叩上苍，《危言》十万播遐荒。平戎未遂

班生志，上策还同贾谊狂。内患外忧萦绪绪，天时人事感茫茫。中书粉饰今应变，请诵绸缪未雨章。

《危言》的初次增订

甲午本《危言》刊行不久，郑观应就对其重加增订。《危言》的初次增订，大约始于一八九四年下半年，止于一八九五年九月乙未本付印。这一年內，北洋水师毁于大东沟，陆军溃于朝鲜；邓世昌殉国，左宝贵阵亡。清政府的败绩又一次刺激了郑观应。他焦虑国家的衰败，蹶而不振；愤恨“倭奴”“失驯”，蚕食中华；^②惶恐“北洋水师威海炮台均为倭有”，“其意不破北京，不饱所欲”；^③担忧李鸿章在日被刺，“枪弹尚未取出，眼下已觉浮肿”，谈判中断，由李经方代理斡旋，“藉各国帮忙”的转机落空。^④凡此种种，均坚定和促使郑观应革旧鼎新的信念与《危言》的增订。但是，由于他难于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，在其思想和增订的《危言》里，一些立场和见解，主张和要求，往往呈现出摇摆和不彻底性。

郑观应将五卷本增订为十四卷本，基本上做了两件工作。一件是内容的充实与提炼，将甲午本《危言》中的“未言者”，在乙未本里得以“尽言”。“未言者”有两种。一种如华工问题，原在《救时揭要》中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，^⑤后来郑观应将其压缩，收进《易言》，取名“招工”。迨编《危言》甲午本，再将“招工”篇略加修改，并同吴广霁的《查视秘魯华工记》，改篇名为“贩奴”。诸如此类以前没有说透的部分，作者不是全部删削，而是修改、补充加以保留。另一种“未言者”，如“江防”，“炮台”等篇，则是作者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增补的。其重心是甲午失利后，对军事防务的设想，也是《危言》增订重加着墨的部分。增订工作的另一件事，是分门别类，作编排上的

调整。将甲午本原来编次，重新提纲挈领分成“富国”、“开源”、“强兵”、“节流”四个大类。原“道器”、“学校”、“考试”、“吏治”等篇，列入乙未本的“富国”类；扩大“商战”、“商船”、“商务”等篇幅内容，归入“富国”类内；为了明确和突出对敌的防御，改篇名“防海”、“防边”为“海防”、“边防”，并增加“练将”、“练兵”（下）、“民团”（下）、“江防”、“炮台”等篇。显然，郑观应的改动和增补，基本上环绕着甲午战争以后的局势，及其所总结出商战、兵战要在中国并行不悖的必要性。

《危言》的再次增订

《危言》的第二次增订，始于戊戌变法的前一年（一八九七年）。这里以郑观应“汉阳差次得沪友书，赋此志感”五绝为证。^②诗共四首，其中心是表叙作者力主实践、力戒空言的主张，及其受到蜚风谤雨打击后的感慨。兹录其一，其四：

世变书增订，忧深语更烦。士夫宜实践，经世耻空言。

英雄多患难，忠直必招谗。举世谁知己，行歌泪满衫。

“汉阳差次得沪友书”。“汉阳”即指汉阳铁厂。该厂原是一张之洞官办铁厂，因管理腐败、经营不善，连年亏蚀，官帑不敷而难于维持。后来，张之洞只得把铁厂交给盛宣怀官督商办。盛宣怀接办后，于一八九六年五月，将郑观应从招商局调往汉阳铁厂任总办。郑观应初到汉阳铁厂，原想锐意整顿和经营。但到汉阳不久，他发现汉阳铁厂积重难返，又看到地方势力

的掣肘和派系的逐鹿，便逐渐失去了信心。（另有一种说法，郑观应原来就不想离开招商局到汉阳铁厂。）“苏报事件”（详下文）发生以后，他积忿难泄，耿耿于怀，多次借口便血和负有舞弊恶名，要回上海医治和静养。经与盛宣怀反复函商，于一八九七年告病返沪，自此抽身，不返黄鹤故地。“汉阳差次”，即指一八九六年五月至一八九七年七月期间办汉阳铁厂事。“沪友”不详，疑是作者的文字密友、《危言》增订者吴广霈。按诗“世变书增订”句，郑观应友人的信中可能谈及《危言》增订之事，所以郑也以《危言》增订作为诗的发语。从诗的语气和沪友的身份看，吴广霈的可能性较大。另外，吴是“苏报事件”具体处理的当事人之一，曾数次去《苏报》馆交涉，与郑观应的通信颇为频繁。且态度又与郑相同，比较强硬。不同于盛宣怀等人持息事宁人的态度。

“世变书增订，忧深语更烦”。此乃郑观应于忽苍忽黄的环境内，增订《危言》的心情自叙：他悬肘握管，杞忧阵阵，意绪烦乱，无从落笔。至于他是否已经预感到，一场政治变革的运动势所必然，近在眉睫，这里就不下结论了。

“英雄多患难，忠直必招谗”。这是郑观应历尽坎坷之途的患怨、愤懑。所称“多患难”，最好的注脚就是郑观应述志诗所说的“七险九难”：如冒险侦察军事情报；因杨桂轩欠款的牵连，在香港拘留半年的家难。所称“必招谗”，无疑则指“苏报事件”。

“苏报事件”，发生在一八九七年三月。他因经办洋务与盛宣怀的关系日益密切，遂为“武进党”的要员，为“（轮船招）商局内外作弊者”所嫉恶。^⑤一八九七年三月，“颇有积蓄，党羽极众”的张某联合报界记者在《苏报》发难，以“总办得人”为题，“揭露”郑观应在招商局营私舞弊、贪污中饱。（其它报

也有刊载)郑观应适在汉阳,闻知后十分恼怒,频频寄函盛宣怀要离职回沪控告。并托经元善、盛宣怀与何启商量,按西律起诉。盛宣怀因铁厂不愿郑观应离去,便劝慰郑观应:“鄙意,狂吠不值计较,莫如包以大度,久之自然销声钳口。公拟挺身理论,迂矣。”^{②6}意思是要郑观应听之任之,不了了之。然而,郑观应却不愿罢休,并迁怨盛宣怀:“《苏报》如此狂妄,各友畏之如虎,今观应被谤之事皆诬。自问权操必胜,既然休戚相关,嫉恶如仇者,为地方官亦不一援,惟有自行出面,为世人除此恶习。”^{②7}嗣后,唐茂枝、梁纶卿也同加劝慰,并由盛宣怀领衔,经元善、梁纶卿、卓子如、徐润、唐茂枝等人联合署名,在《苏报》发表“不平则鸣”的驳文。又隔不久,即四月中旬《苏报》馆的生驹悦,发表“复不平则鸣公启”,作了一番掩饰,此案方告结束。^{②8}

“苏报事件”发生,对于郑观应去留铁厂的关系很大,自此他经常致函盛宣怀,要求辞去汉阳铁厂的总办职务。“居易(郑观应隐名)无他意,惟虑《苏报》之计不行,或有别计蛊惑清听。与其负屈将来,不若洁身早退耳。如我公以居易愚戇可资驱策,拟请升为会办,咨请北洋,扎飭半年在沪,半年在汉,与我公轮流往来。”或者“于今冬改派电报粤局差事”。^{②9}至七月初,郑观应又致函盛宣怀,讲他的病“勿利于是地”,“蒙神人梦示速离汉厂,静养百日,否则必生他病。”^{③0}时隔二旬,七月二十四日,郑观应又藉口小老婆生疮,乘“江宽”轮返沪。^{③1}

根据上述,《危言》第二次增订之始,似在郑观应未离汉阳铁厂以前、“苏报事件”发生不久的一八九七年四五月间。或者说,该年的四五月前不久,郑观应已经着手《危言》的第二次增订。

“交涉”篇与“议院”篇一样,甲午本、乙未本、庚子本三

种本子各不相同。甲午本正文一篇，附录“《申报》中西交涉损益论”一篇；乙未本保留甲午本正文，增添“交涉”（下），删去“《申报》中西交涉损益论”，改用“薛叔耘星使变法论”为附录；庚子本保留乙未本“交涉”（上、下），删去甲午本、乙未本的附录。郑观应二次增订，最早的甲午本“交涉”篇正文，除文字稍有改动外，均被乙未本、庚子本所保留。而从庚子本的变动中，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九〇〇年初，第二次的增订还在进行。

乃近年日人深悟其非，痛革积习，更定刑章，仿行西例，遂改由日官审判，彼此均无枉纵，而邦交亦由此日亲。噫，今日亚细亚洲以中国为最大，堂堂大国顾犹不如日本焉。——甲午本

乃近年日人深悟其非，痛革积习，更定刑章，仿行西例，遂改由日官审判，彼此均无枉纵，而邦交亦由此日亲。竟于光绪二十五年收回租界。噫，亚细亚洲以中国为最大，二十三行省不如日本三岛。——庚子本

看二种本子对照的结果，庚子本中的“光绪二十五年收回租界”，是甲午本中所没有的。再从这句过去完成式的陈述句的时态判断，显然是作者光绪二十五年以后所加。这正说明光绪二十六年，至少是该年年初，郑观应还在充实《危言》的内容。那么，《危言》第二次增订何时结束的呢？“重刻《盛世危言》增订新编后序”的作者黄瑞勋所署日期可定大略。黄序完成于“光绪二十六年中秋”，即一九〇〇年九月。又，庚子本是该年内付印，据此推测，第二次增订的结束，当在一九〇〇年九月中旬以后的三四个月内。

决非唯一的因素

郑观应增订《危言》的目的，在庚子本“凡例”里开宗明义地指出，是为了“变法自强，百废俱举；除积习，戒因循；黜浮文，崇实学；大改蒙蔽泄沓之风。”因此，增订的篇章几乎都是有的放矢。诚然，郑观应某时的某主张、某见解有独到之处，在其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主导地位。但这是否会直接影响到《危言》增订的篇章安排？具体地说，“议院”篇从乙未本第二十七篇移至庚子本的第二篇，是不是与作者强烈要求设立议院的观念有关？我们认为有关系，但不是决定因素。假若以此作为决定因素的话，那么将乙未本第二十九篇“公举”、第三十篇“公法”、第八十篇“交涉”、第八十二篇“条约”、第八十四篇“教养”分别列入庚子本的第四篇、第七篇、第八篇、第十篇、第十一篇就无法解释。为此，要探索郑观应移动篇章的原因，还需要多方面的考虑，尤其是编书的体例。众所周知，《危言》甲午本的体例，郑观应基本上沿袭《救时揭要》、《易言》的体例，没有分门别类，概以文章时序和卷序编次。编乙未本时，作者的编书体例有了发展，做了初步的改进。开始分门别类，将所有篇章提纲挈领地分成“富国”、“开源”、“强兵”、“节流”四个大类。如前文所叙，这样地分类是为了富国强兵的需要。至编庚子本，作者要适应新的形势，对《危言》的编书体例重新作一番调整，把乙未本的四类篇章做新的组合，按清朝官制六部顺序分成“礼政”、“吏政”、“户政”、“兵政”、“工政”、“刑政”冠以“通论”为七个大类。而“通论”的主要内容是原来乙未本中的“开源”类里的“议院”（上、下），“公举”、“公法”、“日报”以及“节流”类中的“交涉”（上、下），“条约”、“教养”等归并而成，作为重点编在庚子本的首卷。郑观应之所以作如此的

组合，既是考虑到要适应于变法的改制，又是考虑到篇章主题的明确和分类更加科学、更加准确。所谓变法改制，当然不只是一件设立议院的事，而是要涉及到许多方面。不过，不能否认郑观应的议院观念，在其中期和后期的认识上存有差别，且后期较为强烈些。但是，他中后期重视议院，切盼设立议院的心情，决非庚子本篇章调整的唯一因素。

《危言》常见的几种版本

《危言》的各种版本，有说八种，有说十种，也有说十五六种，言人人殊，莫衷一是。近来我们搜访、查阅一些《危言》的本子，发现各说不一的原因，主要是书商图利、以假乱真所致。比较典型的是甲午本、乙未本刊行之后，书商将冯桂芬、李提摩太、徐建寅等人的著作（译著），冒充为《危言》的续编、外编；还有的书商将郑观应的《易言》混同甲午本、冯桂芬等人的文章，充作《危言》的初编、二编、三编；再有的书商将乙未本十四卷改头换面合成九卷，称为《增订正续〈盛世危言〉》。郑观应以二十六年的时间著成《危言》，经过两次增订，又因其影响大，翻印多，出现版本繁乱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。况且这些真伪杂陈的本子，对于郑观应思想的宣传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传播，毕竟还有点滴的作用。倘不拘泥于版本仍可使用和参考。但作为郑观应《危言》版本的研究，它们的价值就不如郑观应手定的甲午本、乙未本、庚子本以及呈廷本、总署刷印本。因为商人的粗制滥造，错误很多，以讹传讹，乃至失真。尤其是石印本、缩本中的序跋，东拉西扯、花样不少，容易使人混乱，误当作完善、上好的版本。

为了便于研究者的应用和参考，我们把通常所见的几种《危言》本子，列表介绍于下，并请同志们指正和补充。

出版年月	书名	书型	卷数	篇目数	册数	序跋作者	刊行单位	备注
1894年3月 (甲午)	盛世危言		五	正文57 附录17	五	序言: 彭玉麐、郑藻如、陈炽、郑观应 跋: 吴广霈、杨毓辉		郑观应手订
	盛世危言	大本	同上	同上	同上	同上		镶黄精装、总署刷印本
1895年7月	盛世危言	缩印	同上	同上	同上	同上	上海古香阁	
1895年7月	盛世危言 续编、外编	巾箱石印	续编三 外编二	续编37 外编20	三	续编序言: 王韬 外编序言: 冯桂芬辑著	上海赐书堂	系《新政论议》二种
1895年9月 (乙未)	盛世危言 增订新编		十四	正文100 附录 44	八	郑华熙奏稿 序言: 彭玉麐、郑藻如、陈炽、郑观应 增订新编凡例六则 世界全图 跋: 吴广霈、杨毓辉、王韬 《易言》原跋) 后序: 郑观应		书名签署李盛铎 扉页书名签署吴昌硕 郑观应手订

出版年月	书名	书型	卷数	篇目数	册数	序跋作者	刊行单位	备注
1896年	盛世危言	巾箱石印	五	正文57 附录17 后附10	五	同甲午本	上海书局	
1897年秋	盛世危言 三编	巾箱石印	六	正文44 附录10	三			
	增订正盛世危言	巾箱石印	九	同乙未本	八	同乙未本	上海六先书局	
1898年4月	盛世危言二编、三编、初编	排印	初编六 二编四 三编三		六	初编同甲午本	图书集成书局	二编系《易言》，三编系统、外编该版本错误较多
1900年 (庚子)	增订新编盛世危言		八		八	同乙未本，文字稍有改动		郑观应手订
1910年10月	盛世危言文集续编		八	211	八		翰华阁	此集未曾见读，据徐恩成致郑观应函获知。录出供研究者参考

〔附录〕

郑观应致上海袁道台*

〔海观〕仁兄大人阁下：辰维萃祉延厘，履福笃祐，如颂如慰。弟前拙著《盛世危言》一书，曩为书坊翻刻小本或铅版或石印，皆欲省费致有割裂、错漏等弊。前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间函请上海道台蔡〔钧〕观察出示“只准翻印大版，不准石印缩本，并有割裂等弊”在案。无如日久玩生，今闻有书坊复翻印小本，且将光绪元年前后所刻之拙著《易言》改名重印，出售图利，误人匪浅。故特函恳台端援案给与谕示，以杜射利，而误后学。备纫公谊，专此，敬请台安。诸惟荃照不宣。

- 此件摘录于郑观应未刊资料，原件系草稿，无日期，据考证当在一九〇一年初。

注释：

- ① 盛宣怀未刊资料（藏上海图书馆），“郑观应致盛宣怀函”，一八九五年三月
- ② 《危言·彭序》，甲午本
- ③ 盛宣怀未刊资料，“郑观应致盛宣怀函”，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三日
- ④ 盛宣怀未刊资料，“郑观应致盛宣怀函”，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四日
- ⑤ 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（一八九八年刊印本），“述志四十韵”，页六十
- ⑥ 盛宣怀未刊资料，“盛宣怀致郑观应函”，一八九五年四月八日
- ⑦ 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扎未刊稿，“郑观应致汪康年函”，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。《出版与研究》第五十三期第三十七页
- ⑧ 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扎未刊稿，“郑观应致汪康年函”，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
- ⑨ 盛宣怀未刊资料，外文报章摘译稿，一八九七年三月二日。《出版与研究》第五十三期 第三十七页
- ⑩ 同⑤

- ⑪ 《危言·自序》，甲午本
- ⑫ 《待鹤山人六秩寿诗唱和集》上卷，页四、五，（一九〇三年刊印本）
- ⑬ 郑观应未刊资料（藏上海图书馆），龙佐才：“诰授荣禄大夫陶斋方伯夫子大人七十大庆祝辞”
- ⑭ 《危言·郑序》，甲午本
- ⑮ 《李文忠公全书·奏稿》，卷三十二，页三；卷三十三，页十九
- ⑯ 《晋山县志·列传》（一九二四年刻印本），卷十一，页十九
- ⑰ 《危言》刊印以后，郑观应的朋僚对其中某些观点有不同的看法，而引起了争论。如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“答邱凤源孝廉论《盛世危言·公法》”，首句即“公法知难笔舌争”。
- ⑱ 吴尹全：《罗浮待鹤山人节略》
- ⑲ 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（一八九八年刊印本），“《盛世危言》付梓有感”，页二十四
- ⑳ “乙未元旦感作”，据郑观应未刊资料诗集残页原作“妻子惊多病，倭奴恨失驯”。于宣统元年（一九〇九年）郑观应再版时改为“淮勇羞降敌，台湾恨属人。”
- ㉑ 盛宣怀未刊资料，“郑观应致盛宣怀函”，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
- ㉒ 同㉑
- ㉓ 《救时揭要》共二十四篇，其中涉及华工的文章占七篇。
- ㉔ 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（一九〇九年刊印本），页二十九
- ㉕ 盛宣怀未刊资料，“郑观应致盛宣怀函”，一八九七年四月十八日
- ㉖ 盛宣怀未刊资料，“盛宣怀致郑观应函”，一八九七年四月
- ㉗ 同㉕
- ㉘ 盛宣怀未刊资料，《苏报》残页，一八九七年四月
- ㉙ 盛宣怀未刊资料，“郑观应致盛宣怀函”，一八九七年四月
- ㉚ 盛宣怀未刊资料，“郑观应致盛宣怀函”，一八九七年七月二日
- ㉛ 盛宣怀未刊资料，“郑观应致盛宣怀函”，一八九七年七月二十四日